

兒童保護輸送體系之檢討與省思

郭靜晃

一、前言

「兒童是國家的主人翁，未來的棟梁」。如果國家不能保護他們，使兒童或少年遭遇不幸或惡待(*child maltreat*)，抑或是未提供機會使其發揮應有的潛能，而導致其犯罪，家庭流離失散，甚至社會充滿暴力的迷失，這不僅是其個人、家庭的損失，更造成沈痛又複雜的社會問題。誠如我們所知，兒童不像成人，在生理、思想及行為上業臻成熟，可以獨立自主的生活，因此，他們被合法賦予免於負擔成人責任的一個「依賴」階段（余漢儀，民國八十四：八），也唯有兒童受到良好的保護，兒童權利受到尊重，兒童福利服務發揮效能，才能避免他們受到傷害。

兒童的發展需求即有賴於其所依存的環境來提供，到底該由誰來負責？而大部分的社會，家庭往往成為兒童與社會的中介，社會

不視兒童為獨立的個體，而是附屬於父母之名下，其所擁有之權力更立基於其父母之社會地位(*i. e.*，取決於父母購買、聯結社會資源之能力)（余漢儀，八十四：八）。兒童出生於家庭，成長於社會，而家庭係構成社會之基本單位，所以，兒童受其所處環境所影響。就此看來，兒童保護服務之目標宜建立在盡力照顧兒童和家庭。鄭瑞隆（民八〇：一七九）提出：兒童保護之觀念宜由「懲罰式」（只有處罰條文）走向「合作、支持式」（親職教育）；換言之，兒童保護服務之目標應包括了提供適切的支持性服務和專業諮商的混合式服務來協助家庭，為兒童提供適當的照顧(Gelles & Cornell, 1990)。

由於兒童虐待的發生大都是家庭問題，可能來自施虐者身心病態或親子關係失調，而以往兒童保護處理方法是將兒童帶離家庭，當處遇是唯一選擇時（通常是替代性服務），吾人必須留意：虐待原因是多元性，所以社工員的態度應從解決問題取向為主，而且要

提供多元化服務及多元化的專業訓練，一方面爭取案主父母的合作，另一方面考量兒童的最佳利益(best interest)，使社工專業發揮使能(empowerment)，共同為案家重建功能，畢竟兒童終究適合生長於功能健全的親生家庭（鄭瑞隆，民八〇；余漢儀，民八十四）

就上述處遇方式最大的難題是經費，有了經費才有專業的訓練，更才能有使能的多元化專業服務；除此之外，我們更需要有完善的制度、政策及法規。目前我們兒童保護工作，來自一九七七年WIC(1981)在台灣地區進行田野調查台北醫療機構有關兒童虐待之統計資料，到一九八八年中華兒童福利基金會與東海大學的回應至一九九三兒童福利法修法和一九八九少年福利法藉法律來規範兒童與少年保護之業務（余漢儀，民八十四年）。就歷史之演進，雖然我國從事保護工作之單位與法規也日漸增多，但大多數仍屬於單一種單位獨自提供服務，缺乏全面性的協調聯繫，成效自然不彰。

縱然，近年來我們的經費、法規、制度漸進改善也趨於完善，因而建立完善的兒童保護服務系統便刻不容緩。但即使是最好的兒童保護的處遇，也只是反應兒童虐待案件的一種反應式的福利服務。適切的處理兒童虐待問題，可以預防家庭發生更進一步的虐待行為，但卻永遠無法預防已發生的虐待事件。馮燕在「兒童保護服務網絡的社區防治工作」論文中引述國外研究，如美國兒童保護基金(Children's Defense Fund)發現產前保健服務的一美元投資，可節省日後三到十一美元的醫療與住院費用；婦幼營養方案(WIC Program)中每一美元的成本，可節省日後三元的嬰兒住院費用；CDF花在一

美元的早期療育費用，即可免去將來三美元的特殊教育費用；及Berreuta-Clement et al. (1984)研究發現一美元的學前托育費用可抵免未來七美元學業成就、升學率、就業率及犯罪率等之公共支出的回收（馮燕，民八十四：二二六—二二七）。以上種種在相關兒童與家庭服務領域之研究，皆已證實初級預防性服務方案之高本息比。

綜合上述之論點，我們可得知：

(一)理想的兒童福利是主導性(proactive)的。主導性兒童福利指的是，政府要主動提供幫助兒童潛能得以發揮的環境及一些預防策略及措施來避免兒童受到傷害。由於資源有限，政府部門的兒童福利常以處遇(treatment)來解決父母無法滿足孩子成長必要需求時的問題為主(i.e., 殘補式的兒童福利服務)。例如因死亡、離婚、分居、監禁導致父母無法發揮親職功能；或因疾病、藥物濫用等而成為不適任父母；有時則因孩童的生理、心理特質使親子互動不良而導致虐待；又有時是家庭所在的體系出了問題，如失業，而使父母無法充分扮演其角色（余漢儀，民八十三：九九）。然而政府部門在處遇時，對服務對象之選定常又考慮到公平(equity)、效率(eficiency)及政治上可行性(political feasibility)三個原則之間的平衡(Shalock & Thornton, 一九八八引自余漢儀，民八十三：九九頁)。所以，政府在選擇的處遇方案常是以暫時性而且可以短暫預收成效的服務為主。

(二)必然地，對於遭受迫害或傷害的兒童，以及潛在的兒童受害

者之生命與福利而言，處遇是絕對必要的方法。然而，即使有效的處遇方案和實行，也無法打破與暴力有關的文化規範與價值觀的循環面，這些循環也助長了兒童及家庭虐待或暴力的本質。只有進行此類的處遇方案，是不足以改變社會和家庭有暴力性和虐待性的特質。

由於兒童保護預防方案與兒童福利政策之中心目標是防範惡虐情形的發生。本文主要是以兒童保護輸送體系為主軸，以應然而為架構，以實然面為印驗，冀望建立兒童保護的網絡體系，並藉由實務的分享以說明我們兒童保護輸送體系的不足之處。在了解缺失與不足之處，期望藉由理想體系的功能發揮，降低兒童虐待的層次及頻率，以期達到落實兒童福祉的保障。

二、台灣地區兒童保護現況

近年來，報章雜誌聳動的標題、電視公益廣告中所刊登有關兒童綁架、虐待、強暴、猥褻、兒童或青少年自殺、兒童適應不良、食物中毒、乞丐兒、深夜賣花兒、色情傳播等侵害兒童身心的事件，甚至於有通報孩童遭受凌虐致死，實令人觸目驚心。雖然我國經濟成長，兒童在物質上的生活條件並不匱乏，但隨之而來的是，社會忽視了兒童的權利，傷害兒童身心安全的危機，以及不利兒童健全成長的誘因潛伏於生活環境中，在號稱「兒童是家庭珍寶」的現代社會中，實是一大諷刺。

社會的變遷，如人口結構改變，造成家庭人口數減少，並以核心家庭為主而使得家庭之功能逐漸式微；個人主義抬頭造成婦女為追求個人、自我及經濟的成就而吸引婦女前往就業市場；社會經濟結構的改變，使得社會需要勞動工作的機會降低，取而代之的是服務及不需太多勞力的工作機會增加，也刺激婦女就業的意願；經濟所得的提增及通貨膨脹的上升，使得男人一份薪水不足以家庭生活所需的開銷，為求家庭經濟生活的充裕，以提昇家庭經濟生活品質。以上種種皆促使以往在家照顧孩子的婦女走出家庭而投入了工作市場（job market），而家庭的社會資源（親戚、鄰里、朋友）也愈來愈少。眼看這些兒童無處可去，只有早點上學或下課後到才藝課後輔導班或獨自在家成為鑰匙兒；此外，有些家庭對兒童的教養方式抱持著「父母權威」、「不打不成器」、「棒下出孝子」、「管教子女是自家事」的觀念，更增加了兒童保護工作的困難。

兒童教養方式是否適當，不但關係到兒童身心健康，且影響到家庭之圓滿、社會之和諧、國家之發展，因此先進國家莫不透過法令對兒童人權予以適當的維護，甚至於必要時取得監護權，避免因教育方式不當，戕害兒童身心健康，並危及社會國家整體利益，此種基於人道立場及社會國家之利益，於適當時機由國家公權來保護兒童，此乃國家公權之精義（例如我國兒福法及少福法）。而美國一九八〇的兒童福利及領養法案（Adoption Assistance and Child Welfare Act）則強調家庭重聚，規定社工員在一年半要評估兒童是否繼續寄養或回家團圓或安排領養，故而社工員在擔心如進行訪視

後還有受虐事件發生，社工員將受處罰；故而社工員會捨棄「長遠規則」(Permanency planning)的原則，將兒童留置在原生家庭(較符合兒童本位、最佳利益)而選擇將兒童移離家庭安排寄養(余漢儀，民八十四年：二〇六頁)

台灣地區自一九八八年民間機構「中華兒童福利基金會」先期倡導兒童保護議題後，縣市政府單位的回應可分為三級：(1)台北市政府社會局於一九八九年一月自設兒童保護專線接受通報；(2)高雄市政府則於一九八九年底與民間機構籌組「高雄地區兒童保護聯合會」，一起協調受理兒虐案件；(3)大部分縣市則全權委託民間機構處理，或各設專線接受通報，或分區協調(余漢儀，民八十五：一)。

可惜在當時的環境，由於缺乏相關立法依據，也使早期兒保工作窒礙難行，之後，由於民國七十八年初公布的「少年福利法」中，明文規定針對受虐案例的保護受虐者監護權之停止可直接由檢查官、主管機構或少年福利機構向法院聲請，而法院選定監護人時又可不再受限於民法一〇九四條，可直接指定主管機構之負責人或其他適當者為監護人，這使得公權力介入家庭內不當的親子互動有法律基礎。又直到民國八十二年二月修訂公布的「兒童福利法」中，則對保護通報制度、安置保護、監護權異動及主管機關之權責有較明確之規定。甚至於，此兩法對於兒童及少年行為之規範，以及兒童／少年應受到那些保護，以保護之相關責任人如有違法事由則加重罰則，並新增「親職教育」輔導。

目前，台灣地區在兒童保護之提供，基本上有通報調查、機構收容安置、寄養家庭服務及領養服務。而其中，又以民間機構扮演極重大的角色，例如通報調查工作除了台北縣(市)外，幾乎都會委託中華兒童福利基金會或台灣世界展望會辦理。機構收容安置則是透過轉介案主人數，來補助收容之育幼院。寄養家庭服務更是由中華兒童福利基金會早在一九八一年主動提出，目前除了台北市委託台灣世界展望會外，其他縣市均為透過購買服務合約的方式(SOC)委託中華兒童福利基金會。領養服務主要是透過非機構式領養，亦即黑市或灰市；台北市則委託兒童福利聯盟進行領養專案，蘇靖媛(民七十八年)針對台北市聲請領養認可之養父母之研究歸納發現，養父母是由收養親友或配偶子女直接安置有五六·九%，灰市安置的有二一·九%，黑市的有一八·三%，而合法機構安置的只有二·九%。由於領養人之偏好及大環境服務設施不足、永久停止親權之裁定困難等問題，受虐兒的出養困難仍因難重重(余漢儀：民八十四：二五三)。

我國寄養家庭服務計畫自民國七十年七月至七十二年六月止試辦二年，在試辦成效優良，於同年(七十二年)七月開始正式辦理，至七十八年度止，經安置之兒童有一、一三五人，其中已終止寄養者九二七人(台灣省社會處，民八〇)；台北市、高雄市亦陸續開辦。截至民國八十二年底為止，我國寄養家庭數為二五一家，其中台灣省一九五家，台北市二十七家，高雄市二十九家；被寄養兒童人數為四五一，其中台灣省三五五人，台北市四十七人，高雄

市四十九人（內政部統計處，民八十三年）。由於國人觀念不如西方當考慮兒童需要替代性服務，會優先考慮給予家庭寄養安置，加上宣導工作不足，目前仍無法普遍實施此種暫時性的處遇安置。

暫時性的安置，將受虐兒童安置於寄養家庭、收容之家或團體之家，皆不是一前瞻性及符合兒童應在親生家庭成長的最佳利益的方案。由於兒童不斷進出寄養照護(foster care)的「流盪現象」(drift)，以及孩子需要與父母能維持一個合適的聯結或情緒聯結(par-ental bond or emotional bond)，此類的處遇幾乎針對施虐父母，而不是以受虐兒為焦點(focus)，而兒童在此類的安置不見得獲其利，反蒙其害。兒童保護服務之目標宜建立在對兒童及其家庭的照顧。而涉案的家庭所需要的服務範圍很廣而且具多元性，例如涵括臨床治療到實質具體的日托、醫療、就業輔導，甚至到反貧窮、反色情等社區方案，也就是社會福利社區化的具體精神；換言之，這也是預防性及主導性的兒童福利服務，此種服務包括強化親子關係的家庭取向的育兒、提供親職教育、消除貧窮及其他環境壓力、降低暴力及體罰之文化增強等（余漢儀，民八十四：二〇六）。

從上述對台灣近年來兒童保護現況的論述中，吾人可發現政府在最近十年來對於民間團體及社會對兒保要求之回應也相當多，但為何總在相關場合聽到兒保人員滿腹苦水，如對八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全省統一兒少保熱線開辦後，社工員不是表示不願意值夜班，或此辦法無法落實或出於安全顧慮、加班費、補休等問題表示不贊成；對於目前工作量深覺負荷重而且又要兼辦其他業務；由於工作

情境不可控制因素而產生無力感等壓力造成流動率(turnover rate)高；施虐家庭不肯合作、採證困難、自身安全受威脅、警政單位配合度低等也造成兒保訪視之困擾；甚至於兒保人員認為兒保工作最主要的困難為：原生家庭服務缺乏（缺乏長久之規劃）、兒童安置處所缺乏、工作負荷量大、工作人員經驗不足及醫療、警政單位配合差等（見余漢儀，民八十五：十七—十九）。此外，報章新聞也常有兒童又遭凌虐甚至致死，甚至於社工員由於精神枯竭，工作壓力重，有另外的出路而造成流動性高（聯合報，民八十五年六月十四日），這些原因除了人力不足外，還有那些原因呢？表一是台灣地區約一八〇位政府兒保社工員，雖然大多數為相關科系畢業，但由於兼辦其他煩雜之業務及年資不高，也影響其累積兒保的實務經驗。此外，在台灣地區二十三縣市中首先回應中華兒童福利基金會台北市、高雄市、台北縣、嘉義縣及雲林縣，其餘則在民國八十二年兒童福利法修訂後才開辦兒保業務。而相關兒虐業務則有分自辦、協辦、補助及全託四種層次。

於各地政府由於幅員大小不一，社經資源多寡不同，而且又各自發展兒保策略。依余漢儀（民八十四：八〇）指出，雖然臺灣省各縣市及台北、高雄二市每半年填具的「兒保執行概況統計分析表」雖稍嫌粗略，但可算是最完整的兒保數值。

根據民國八十二年資料，兒少保專線所接一、九三一案例中，有五八%後來留置家中，有可能是案情不嚴重，只須提供支持服務即可（但是否有提供服務，由書面資料不得而知）。其次為暫時寄

表1 各縣市兒保執行及社工配置

	縣市	兒保 接案數	兒保接案率 (萬分之)	社工 人數	兒保 社 工		兒虐通 報業務
					政府	CCF	
北 區	台北縣	176	2.26	41	9	14	補助
	宜蘭縣	39	4.44	12	2	2	補助
	桃園縣	28	0.90	22	7	2	協調
	新竹縣	4	0.49	15	3	1	協調
	基隆市	13	1.98	6	6	2	協調
	新竹市	25	3.78	5	2	-	全託
	苗栗縣	11	1.01	12	2	2	補助
	台中縣	81	2.82	24	7	2	協調
	彰化縣	172	6.63	31	5	1	協調
	南投縣	8	0.76	6	5	3	協調
	雲林縣	33	2.51	20	2	1	協調
	台中市中區	52	3.01	7	7	3	協調
	嘉義縣	18	1.84	19	19	1	協調
	台南縣	5	0.26	32	20	1	協調
	高雄縣	79	3.67	22	1	4	全託
南 區	屏東縣	71	4.36	14	1	3	全託
	澎湖縣	12	7.85	1	1	1	協調
	嘉義市	22	4.56	4	4	-	自辦
	台南市	55	4.04	11	3	2	補助
	屏東縣	24	5.53	6	1	7	全託
	花蓮縣	96	14.98	8	2	2	協調
	台北縣	206	4.45	132	65	-	自辦
	高雄縣	144	5.49	42	4	4	協調
	台北縣	1374		492	178	58	
	台北縣						

來源：各縣市兒童保護執行概況統計分析表，82年。

中華民國台灣地區人口統計，內政部，83年12月，PP.36-63。

養(二九·一五%)，但寄養時間的長短和持續與否也不得而知。至於長期安置的則有六·五三%，在其中應屬於較嚴重之案例。從上述之處遇，大多數為提供支持，再其次為暫時安置，而長期安置比例最少，至於社政單位介入兒虐案家後，除了提供服務外，至於其他評估之效果，或加強其他兒童保護之預防服務及次級的預防兒童保護方案——如家庭重聚服務(family reunification services)及家庭維繫服務(family preservation services)等符合兒童利益之長期規劃的保護方案等更是罕見或幾乎未提供此類服務。

三、兒童保護輸送體系之建構

兒童保護服務係兒童福利輸送服務的主要範圍之一，由於涉及層面涵蓋司法、衛生、社政、教育、警察等不同部門，例如兒童的教育及就學行為係由教育體系關心照顧；若涉及虐待或家庭扶助或家庭就業需求時，

則有社會福利體系提供協助；若有身心健康之問題，亦有衛生保健體系提供服務；若不幸其行為涉及刑罰法令之觸犯，則有警察及司法機構予以適當之處遇及輔導。所以兒童保護之服務需要現有體系多發揮其應有的功能及加以聯繫，則兒童在產生有被傷害之事實而需要被保護之時，均能在任一體系中得到應有之服務。

張紉（民七十七年）從實際各體系之功能分析中指出有兩個缺失（引自曾華源、郭靜晃、曾騰光，民八十五：三四頁）。

（一）兒童如未就學就業時，其生活狀況及行為問題，缺少一個專責機構提供適切的輔導服務。

（二）各體系在執行其功能時，亦有若干限制。例如，兒童保護涉及有一些特殊需要的服務對象濫用親權，或父母因疾病、藥物濫用而成爲不適任父母，諸如此類的親子角色失能而使家庭成爲不適孩子成長之所在，但家庭之挽救及重聚，則需衛生保健體系幫助父母戒除藥物，家庭需要扶助、兒童需要安置等，而使得家庭因社會福利服務之介入程度深淺之不同（如居家服務以強化父母例行的親職功能，親職教育，諮商輔導協助等提高其親職能力等之支持性服務；如課後托育協助父母之一部分親職功能等之補充性服務；如寄養、領養服務可暫時或永久取代父母之親職功能之替代性服務），而對兒童及家庭的生活及福利有所改善。

針對以上的缺失，乃因缺乏各體系（部門）之各機構結合起來，構成一個區域性的兒童保護輸送服務之網絡。兒童福利服務網絡之功能性，在居中協調各單位，使百個兒童在教育、司法／警察、

健康及福利各層面均能得到充分的保障及服務，以健全兒童及其家庭之身心。

從組織學的觀點來看，單靠其內部之資源和力量，很難獲取足夠達成組織設立目標的資源。尤其是非營利組織，如社會福利機構、宗教慈善團體、學校、醫院等，大多需要從其所在的地區中，爭取地區的支持，以獲得足夠地區的資源，以支持其業務的發展（蕭新煌等，民七十二年）。由於福利服務體系中的資源是有限的，民衆的需求是無限的，再加上各項昂貴設備及高使用率的服務浪費，使得原本有限的福利服務資源更加捉襟見肘，在無法滿足民衆的需求之下，許多的社會問題也因此產生，福利服務在缺乏充裕的福利服務資源情況下，也必須透過不同資源的交流，以滿足其需求，而造成福利服務組織對外建立互動的必然性（吳嘉壯，民七十七年）。

台灣由於人口結構變化、婦女就學機會增加及家庭型態變化等社會變遷，造成家庭照顧功能式微及急速都市化，台灣地區的非正式部門（informal sector）——如家庭、鄰里、社區，參與提供福利服務的能力極爲有限。志願組織雖增加許多，但由於專業人力雇用有限，且具專業執行能力之機構也很有限，倒是近年許多企業財團因爲報稅或洗錢緣故紛紛成立基金會，營利組織是否也會在缺乏法令規範基金會的空檔，與志願部門一齊競爭法定部門的資源？如此的發展定會影響甚至會限制到志願部門的發展（Stoess, 1988，引自余漢儀，民84:258），余漢儀（民八十四）甚至摘要近年來台灣地區

福利需求及提供部門的變化（見圖二），圖二除了了解福利需求及提供之變化之外，也可以為我們的兒童保護輸送體系（網絡）建構垂直及平行的體系。

張荳雲（民七十一）在對醫療服務網的形成與組織間關係的建立的實證研究中指出福利服務網路的建立，應同時包含水平和垂直的整合和分工。換言之，平行的概念係指各機構平行的協調和分工合作；而垂直係指一個層級節制及控制(hierarchy and control)的體系。由上述的闡述，兒童保護體系（網絡）之建構是指縱橫兩種型態的結合，以構成網絡對兒童提供必要之預防與處遇的服務。從福利服務機構組織角度來界定，所謂的兒童保護服務體系（網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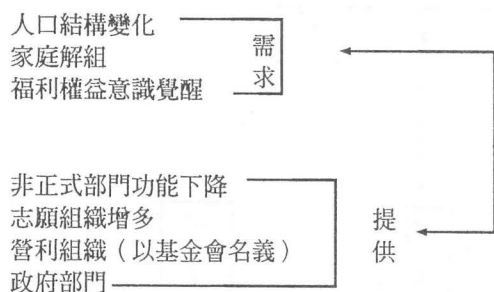


圖2 福利需求及提供部門近年之變化

資料來源：余漢儀（民八十四）兒童虐待—現象檢視與問題反思，台北，巨流書局，二五八頁。

child protection network/system)係由社會、教育、衛生、警政、司法等體系（部門）為垂直架構，再以各體系之服務機構組織之營利組織及志願服務組織為平行架構，在交織其中水平（橫的）和垂直（縱的）的關係（見圖三）。

四、兒童保護輸送體系之應然面

余漢儀（民八十四年）指出：「無可諱言的，台灣地區目前對兒童虐待之了解，及因應之兒童保護策略，幾乎是取法美國六〇年代的模式：透過通報體系將嚴重案例移置家外安置（out-of-home placement）」（一一八頁）。了解美國兒童保護運動之歷史脈絡，實有助於吾人對美國模式的檢視。然而六〇年代之後的婦女運動及七〇年代美國鑒於孩童不斷進出寄養照顧的「流盪現象」，也造成美國發展新的長遠規劃，並尋求符合兒童最佳利益之處遇方案。雖然這些顯然有些精神可以在八十二年兒童福利法修法中有被納入，但是在執行上由於政府在兒童保護之提供不夠明確，相關兒童虐待的各種可能情境及兒童保護責任通報，調查都是新增條文，對於相關懲處對象及罰則是明顯將責任歸於個人，即使是四小時親職教育之提供也是對認知問題之輔導，種種措施也都反應吾人缺乏較具體實質的服務——如日托、藥物濫用、居家照護、就業輔導等預防性的福利服務。

兒童不僅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更是擁有自由權益的市民及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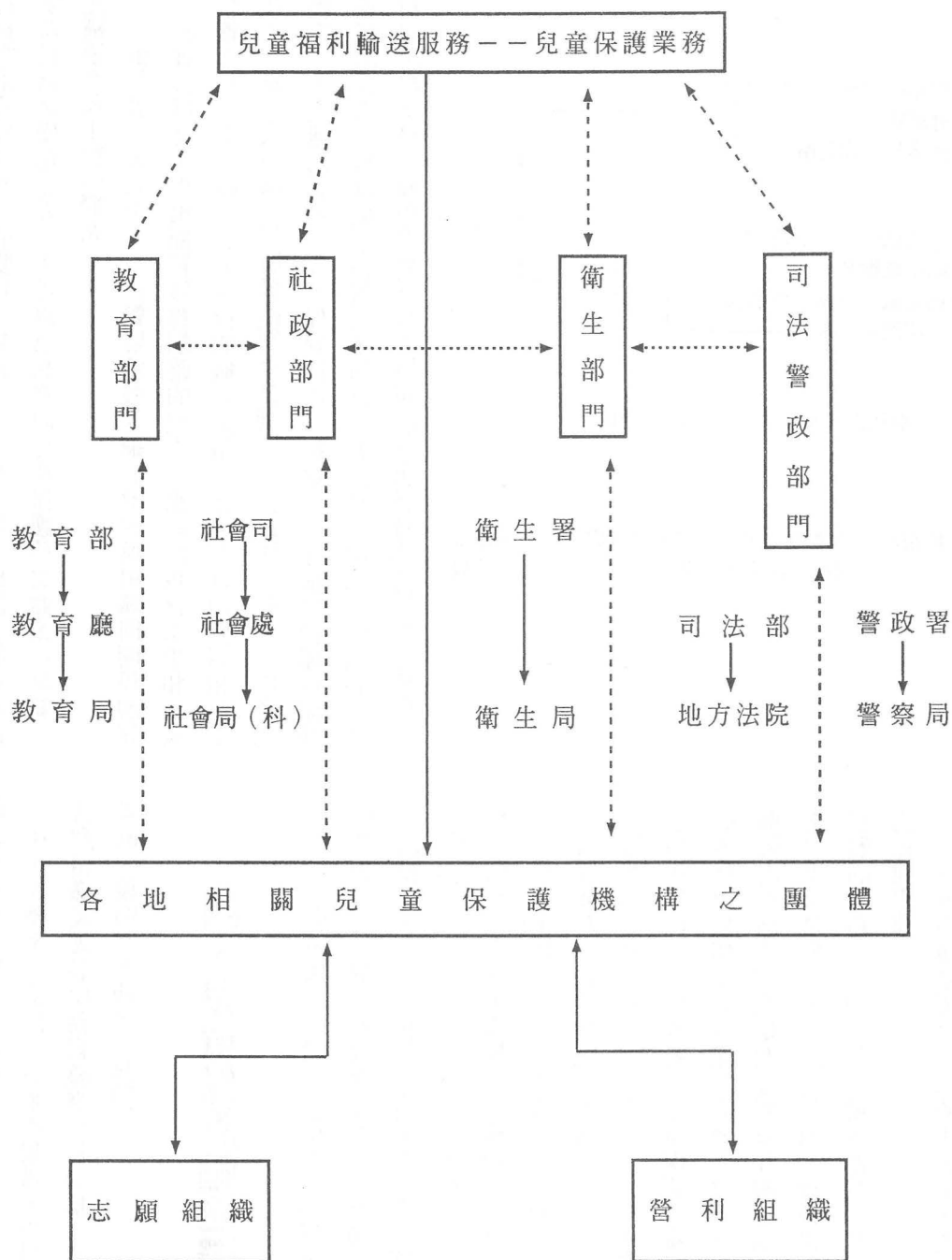


圖3：兒童保護服務輸送體系之網路建構圖

PS：——→ 行政隸屬
 ←-.-.- 業務聯繫

民。當兒童受到身心傷害時，家庭、社會甚至國家必需要保障其身心權益，促進其正常教育，這也是兒童福利立法之最主要精神。然而兒童保護必需是多元的(pluralism)，因為兒童虐待／傷害的原因也是多元的，例如父母的社經地位，社會對暴力之價值規範，個人社會化經驗，父母之精神狀態，家庭情境的壓力或子女所致的壓力等，因此針對種種成因必需提供好的處遇甚至預防的策略來防止暴力行為之影響減至最少，更要防止暴力事件不再發生。

防止暴力事件不再發生，確實是吾人社會最需要的兒童保護的策略，然而此種策略不僅是當兒童發生傷害事件之時，給予處遇，而是更需要積極的預防措施。個人認為要確保兒保輸送體系的建構與發展，首先政府先要建立完善的政策及法規，必要時提供或與民間人力所不能及之大型服務機構，同時積極立法建立社福專業的證照制度，委託一些專業的機構，藉著過程之督導協助以確保權責量(accountability)之發揮。對於一些安置等處遇計畫儘量往公設民營的委託方式，善用社會專業資源，對於服務人員之專業考核、監控規範機構執行人力，避免專業人員工作衰竭，甚至提供在職訓練以加強其管理技巧或迎合其生涯規劃。然而，服務輸送雖委託民間，但政府公信力卻不可能轉移，故政府有責任保證民間團體也能維持基本的服務品質，直接的消費者回饋(feedback)也是政府作為服務輸送之績效指標。(余漢儀，民八十四年)。

除此之外，個人認為兒童保護輸送體系更要確保(1)通報制度的確實執行而且要普及性，但需有集中通報體系之運作，如以各種誘

因及罰則摒除「知情不報」之障礙，集中通報以利檔案建立，及時調查並後續轉介服務；(2)結合各種體系，如社政、衛生、教育、司法及警政機關成為平行之網絡做專業的調查並給予必須的協助；(3)完善的保護服務的處遇並確使工作人員之使能原則(empowerment principle)；(4)兒童最佳利益之選擇，規劃家庭重聚服務及家庭維繫服務等之長遠規劃的方案；(5)執法人員之再教育，因為兒童虐待是屬於法律也是兒童福利的議題(legal issue)；(6)消除社會與家庭之暴力規範與迷思；(7)減少社會造成激起暴力的壓力以及(8)結合家庭與社區之間非正式的支持並加以整合成為完整的社區網絡。

五、結語

兒童福利已不再是單純的人道主義問題，至少目前世界潮流對兒童福利努力的目標，已不只是消極的針對需要救濟和特別照顧的不幸兒童，而是更進一步積極對每個兒童權益的保護，包括各種福利需求如教育、衛生、社會各方面的福利事業。而兒童保護服務是兒童福利主要工作內容之一，所以兒童保護之福利政策可以說是要運用一切有效之社會資源(專業服務及相關體系的資源)，滿足兒童時期生理、心理及社會環境的需求，促使兒童得以充分發揮其潛能，達成均衡且健全發展之目的計畫與方案。

兒童傷害及虐待原因是多元性的，所以服務之提供也是要多元性，兒童保護之輸送除了處遇之外，更要朝解決問題取向，兒童最

佳利益考量，社工專業發揮使能，除了為案主提供照顧與保護，更要為家家重建功能，因為兒童虐待的產生大都是家庭問題，而且兒童畢竟最適合生長於功能健全的親生家庭，而處遇的方式不只是提供殘補性，更要積極提供支持性及補充性的服務方案，甚至要更有前瞻性的預防性的服務。

保護兒童、少年的工作絕不是僅靠政府機構便可以做好。想做好兒童、少年保護工作，除了要社會大眾關愛兒童及青少年，重視他們權利的觀念外，在國家社會福利政策及法規上亦要有確保其權利及保障其權利之具體措施之明文規定，尤其重要的是結合司法、醫療、警察、衛生、教育及社政等機構及民間團體、組織完備的兒童保護網絡，從不同的角度和立場來分析、探索有關兒童、少年的問題及需求，進而在瞭解問題之後，對兒童、少年提供多元化的福利服務，共同創造一個安定、祥和，充滿愛與溫暖的社會環境，利用專業化的服務網絡，使兒童、少年能健全的成長。

兒童目睹家庭暴力，甚至遭受家庭暴力，長大以後會成為施暴者嗎？會成為受虐者嗎？終其一生會成長在暴力的陰霾下嗎？這些問題或許是一種迷思，讓兒童免受傷害、虐待、剝削，這不也是我們從事兒童福利工作者的最大心願嗎？而落實兒童保護之輸送，除了對兒童虐待家庭的介入，並給予處遇，針對問題的成因後果作廣泛的分析及探討，並給予合適的危機處遇及治療等輸送服務，除此之外，高成本效益的預防方案也是值得考慮及推廣。而初級預防方案之實施，應以社區特質為中心，發展設計符合各社區特質的親職

教育課程及宣導，使父母皆有再教育之機會，使其能成功地扮演好親職角色，發揮家庭應有之功能，而使兒童能成長在親生家庭之中，符合兒童最佳利益，以杜絕兒虐的再發生（馮燕，民八十四年：二三五頁）。這也是福利社區化，社區福利化的本質。

（本文係作者——中國文化大學青少年兒童福利系教授兼主任於內政部主辦之「八十五年度全國兒童保護業務研討會」中發表之講詞）

中文部分

1. 內政部統計處 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內政統計提要 民八十三 三三三頁
2. 台灣省社會處 社政年報 民八〇 一五一頁
3. 余漢儀 兒童福利之績效評估——以台北市社會局為例 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刊 二十三 民八十三 九七一—一四二頁
4. 余漢儀 兒童虐待——現象檢視與問題反思 台北 巨流書局 民八十四
5. 余漢儀 兒童保護服務體系之研究 內政部委託 民八十五
6. 張芷雲 醫療服務網的形成與組織間關係的建立 一個實證的研究 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刊 一五 民七十一 一九六—二二一頁
7. 曾華源、郭靜晃、曾騰光 強化少年教養輔導方案之研究 內政

部委託 民八十五年

8. 馮燕 兒童保護服務網絡的社區防治工作——生態區位觀與流行病學理論模型的應用 八十四年國家建設研究會社會福利分組報告

民八十四

9. 鄭瑞隆 兒童虐待及保護服務 周震歐主編 兒童福利 台北
巨流書局 民八〇

西文部分

1. Berrueta-Clement, J., Schweinhart, L., Barenett, W., Epstein, A., & Weikart, D. (1984). *Changed lives: The effects of the Perry preschool program on youths through age 19*. Ypsilant; MI: The High/Scope Press.

2. Gelles, R. J., & Cornell, C. P. (1990). *Intimate violence in families*. CA: Sage Publication, Inc.

3. Schalock, R. L., & Thornton, C. V. D. (1988). *Program evaluation-Field guide for administrators*, NY: Plenum Press.

4. Stoesz, D. (1988). Human service corporations and the welfare state. *Society*, 25(6), 53-58.

5. Wu, D. Y. H. (1981). Child abuse in Taiwan. In J. E. Korbin (Ed.),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s*. LA: Univ. of Californiation Press. p. 139-165.